

程德培等 著

批评史中的作家

批评史中的作家

the Writer,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程德培等 著

THE HISTORY OF

DESIGN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HISTORY OF

DESIGN IN THE 20TH CENTURY

DESIGN IN THE 20TH CENTURY

DESIGN IN THE 20TH CENTURY

批评史中的作家

程德培等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批评史中的作家/程德培等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5321-5331-2

I. ①批… II. ①程…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批评史-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16401 号

责任编辑: 肖海鸥

封面设计: 洪磊

版式设计: 沈伟伟

批评史中的作家

程德培等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华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24 插页 2 字数 358,000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331-2/I·4231 定价: 39.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中国作家协会 2011 年度重点作品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2009 年度资助项目

编委会名单

汪 澜	马文运	孙 颢
臧建民	杨斌华	朱小如
吴 亮	程永新	程德培

目 录

序 一	吴 亮	1
序 二	程永新	9
前 言		16
镜灯天地水火		22
——贾平凹《带灯》及其他		
捆绑之后		48
——《黄雀记》及阐释中的苏童		
打碎,如何重新组合		78
——评长篇小说《日夜书》兼论韩少功的小说修辞		
《牛鬼蛇神》的前世今生		105
——中间停顿二十年的马原叙事及批评史		
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		129
——王安忆和她的批评史		

一个作家的叙事之夜 ——余华和他的批评史	141
“断裂”及其所创造的 ——韩东和他的批评史	160
一个人在路上 ——林白和她的批评史	178
“镜子”里外都是“镜子” ——铁凝小说论	193
地狱与天堂背后的多副面孔 ——对刘恒二十年前旧文本的新阅读	214
魂系彼岸的此岸叙事 ——论迟子建的小说	234
李佩甫的“两地书” ——评《生命册》及其他六部长篇小说	249

方的就是方的 ——论方方小说的叙事锋芒	270
还有无数人的记忆像鸿毛那样飞向天空 ——论《很久以来》的“轻与重”	285
我们需要走在一个能摩擦的地方 ——读宁肯的长篇小说《天·藏》	297
我讲你讲他讲 闲聊对聊神聊 ——《繁花》的上海叙事	313
进步的世界是一个反讽的世界 ——读格非的长篇小说《春尽江南》及其他	328
变化之中有变化 ——范小青长篇小说《香火》读后	346
现实与超现实的“主义” ——阎连科长篇小说《炸裂志》的欲望叙事	360

序 一

吴 亮

—

仅仅三十几年,刚刚逝去不久的历史似乎就像陈旧的剧院幕布已经模糊不清。人们失去了一些东西(创伤、记忆、激情和理想主义),人们也获得了另一些补偿(物质、债务、欲望和虚无主义);新的期待与无所期待,新的梦想旧的梦魇,传统复活或幻想传统可以复活,死人纠缠活人乃至活人冒充死人——辩证法的幽灵归来了,既高唱“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却又拒绝承认同一个世界可以存在同一个普世人类价值观,因为现实毕竟冷酷梦想毕竟是梦想;马克思的幽灵归来了,意识是现实的反映,观念不过是移植到人的脑子里被改造过了的物质东西而已,一切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弗洛伊德的幽灵归来了,精神焦虑、压抑与恐惧不过是现实剧变和备受打击的内在化表征;诺查丹玛斯的幽灵归来了,悲观的末世情怀并未随着二十一世纪的如期降临而黯然消退,相反,末日魔咒以一种逆行方式向未来延长它的有效期;形形色色的浪漫诗人与批判理论的幽灵归来了,普遍的人心惶惶与普遍的幸福感究竟哪一个才是这个时代的普遍心理征候,也许假象就是真相,极乐就是绝望,伟大的工程师恰恰就是最后的掘墓人;荒诞戏剧的幽灵归来了,迫在眉睫的危机感、各式谣言与宫闱秘闻从来没有这样被人们大规模地遍地传诵,而且是带着幸灾乐祸的微笑在彼此传诵……历史的幽灵归来了,它不是以被忠实于真实的记忆形式归来,而是以被遗忘的形式,以记忆残痕的形式,甚至是以刻意忘记和精心伪造的形式——其实这样的历史幽灵,在人们的周围早已徘徊了许多年了。

二

由于上述诸项被文学隐喻化了的原因,还有某些其他无法命名难以命名的原因,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目前无法看清中国历史,所以也不应对此抱有过高希望,但我们还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而不愿意不了了之;记忆必须战胜遗忘,理想必须战胜虚无,不过我们只能根据各自秉持的不同视角、理解形式、所受到的知识影响和个人经验以及价值选择来观察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史——这一记录了人的历程、记忆、想象与歧义的主体历史领域,它绝不能简单地通过一系列大小事件、作家命运与他们的代表作品之简单排列来加以理解。这一次,出于我们的特殊需要,三十多年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不得不被删削了大量枝蔓,放置在具有涵盖性的有关“人的象征处境”之下。我们企图完成的任务是:对那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降的三十年,即当代文学中“人的处境之变迁”从深渊里缓慢上升,然后又如何重新跌落的过程进行再描述;而八十年代,则是我们给自己设置的一个梦幻般的零点,现在让我们折返回去。

三

我将以一种政治叙述作为开端来描述并且定义八十年代文学,尽管就编年史的精确性而言,七十年代末是八十年代的前奏和序幕(那曾是一段令人不敢相信其真实性的梦幻般的历史,它充满戏剧性和偶然性,那种天崩地裂式的剧烈变动几乎不可能发生)。此前的中国“文革”文学是赤裸裸政治的,是鼓吹暴力美学和贫困乌托邦的;虽然从这样被继承下来的既有文学内部发展、分裂与蜕变出来的所谓“新时期文学”也依然毫无疑问地是依附于政治的(表现为变幻莫测的文艺政策),至少在文学表达的自身解放方面(当然很有限)具有扩大了参与政治的意义,而不再是一种被彻底垄断的作为权力意识形态的政治工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参与被越来越多的其他人所分享。

四

文学解放的背后是人的解放。“思想解放”的背景是对“文革”的彻底否定，是大规模改正“冤、假、错”案，是落实政策平反昭雪补发工资恢复名誉。思想解放不只是承诺把头脑从教条中解放出来得以自由表达，也是承诺将人的身体从囹圄中解放出来重获自由，即“人的归来”。人的此岸性取代了彼岸性，当时中国作家普遍误读了马克思的《1844年巴黎手稿》与《费尔巴哈论纲》，他们的彼岸不是天国而是“五七干校”、北大荒和劳改营，他们的此岸也不是倒置了的天国只不过是他们本来就居住的城市乡镇以及他们本来就拥有的职业、权利、名誉和起码的生活条件。活人抓住了幽灵，一个要回家的幽灵，一个人道主义的幽灵在中国上空游荡，活人的此岸性之最大愿望仅仅表现为要求恢复原初的生存状况，如果还远远不能算是改善与赔偿的话。梦幻般的回归旅程开始了，流放者归来了，知青归来了，无数的“我”归来了，艾青写了《归来》，王蒙写了《夜的眼》，北岛带着《我不相信》，顾城带着《一代人》归来了——但是他们作品中的“我”之指代，却已经隐藏着一种行将到来的分离，或作为民族代言人与诗言志的所谓“大我”，或作为叙事主体的“自我”或“个人”——纵然蒙受来自阵营内部的打击清洗历尽苦难，艾青那代诗人包括臧克家们甚至公刘们归来后依然强调集体与民族的价值远高于个人之上，而“我”依然不过是号角式的复数主体；他们不赞成在此后不久的朦胧诗所流露出来的新的美学倾向，这一倾向不仅在阅读接受上是脱离大众的，也是公然或隐秘地宣扬个人主义的。当然朦胧诗事件不可能涵盖当年所有的文学事例，显而易见的是，在“人的归来”的初期文学浪潮中，“一个人的遭遇”式的既往悲情故事被充分倾诉，主人公伤痕累累九死一生，然后，光明降临冤屈获得申诉幸存者得以回家。然而很不幸，当时的主流共识仍然试图证明：任何一个人首先作为国家和集体的一分子，因为实现未来无阶级社会理想和必要的斗争而被错误对待、整肃、清洗与驱逐，都是为了整体利益；最后错误既已纠正，“这个人”重新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他”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应该是感谢而不是无穷无尽的发泄怨恨乃至对某种非人处境从根本制度上产生怀疑。

五

在八十年代初期文学作品中流露、强调个人主义(个人主义至今在中国仍然是一个政治不正确的贬义词,权力崇拜和个人迷信主义却照样大行其道)的并不是那些“痛定思痛”的归来者,倒是一些来自社会边缘身份卑微的写作游离分子,他们没有显赫的前朝名声和光荣的泣血历史,他们是无权者而不是重握权柄的“复出者”。与重握权柄的归来者不同,无权者不仅无法代表任何集体,而且根本保护不了自己;无权者是一个个分散的单体,无权者的个人主义无非就是“争取和拿回”个人权利。在“文革”时期并再往前追溯,无权者大范围的被剥夺被伤害被蔑视,都是以一个个不可替代的渺小个人主体来承担的,至于那个与具体个人相对立的先验集体,却总是扮演了一个不可逾越、无所不在和带有恫吓性的幽灵。

六

所有的整体或全体,都必须合法地还原为个体;所有对社会整体的解释,只有追溯到个体意愿和个体行动才是终极解释;所有所谓的社会整体规律,都可以从个体行动法则或个体意愿的命题中推导出来。八十年代中前期,“文学中的个人主义”以乔装改扮的面目出现我们的视野中,当然还是以一种(或多种)浪潮和群体(或被描述为群体)形态出现的:先锋派(残雪、刘索拉、余华、孙甘露)与寻根派(韩少功、贾平凹、李杭育),英雄(张承志)与反英雄(徐星、洪峰),叙述者(马原)与口述者(张辛欣)以及难以归类的汪曾祺、莫言、阿城、史铁生……他们大异其趣的个人形象隐藏在作品背后,隐藏在故事人物、象征和叙事者背后,他们的个人主义不是作为一种政治哲学主张,而是作为一种文学实践的直接达成;他们的写作指向更为广阔和深邃,在他们作品内部我们发现了一个并没有被极权时代完全耗尽的记忆、想象力和经验的世界,这个至今还未被完全解密的世界依然带着人性的肮脏、幽暗、麻木、变态、血腥、神秘、混乱、荒谬、疾病、仇恨、迷信,以及——永不停息的思考、永不磨灭的灵性与永不放弃的生命之爱。其

中,曾被当时的批评舆论严重误读的中国式现代派,除去表面的时髦形式与怪诞之癖,现代叙述改变了思维扩充了阅读容量及激发了新的感受力,而将欧美个人主义主观主义颠倒为针对中国状况的揭露现实主义之工具,则大大释放了旧有批判现实主义的内在化潜能。

七

那是一个曾经有所期待的文学时代,对文学有期待就是对人有期待。噩梦已去,幸存者归位者弹冠相庆,新格局旧秩序尚未建立,的确存在过一个短暂的政治与文学的蜜月期,几乎所有的写作者都有一种梦幻般的归来感。差异暂时还隐藏着,作家只要以个人名义归来,他的差异性必然要顽强地呈现于外。政治逻辑与政治决断与文学家的善良愿望和天真想象完全不同,除非政治本身具有远为惊人的文学想象。作家的个人秉性千奇百怪,他们是最难以团结的一帮,他们不可能理解政治,他们不是政治的人。于是,“人的归来”,慢慢就分化为政治人的归来,还有文学人的归来。文学是人学,政治也是人学,而且是更人性的人学。当代文学卷帙浩繁,一大堆被记录在案并已公开发表的文学现象不足以自动叙述它自己的真实处境。一定还有大量未发表的被删除的被封存的被遗忘的文字,众所周知的禁区、证据不足的影射、字里行间的暗示,一定还有无数笔记、手稿、私人通信、被录音的谈话尚未公开。文学不保密,文学终归要告白,它们什么时候重见天日,没有人可以阻止。

八

期待,承诺,撤销,反复,朝令夕改;再承诺,拉锯,悼念,诉求,狂欢,寂静,政治比文学更文学。共识终于破裂,达摩克利斯剑掉下,不再需要争论了,太不可能太不可思议,太陌生也太熟悉。必须接受这个现实,这就是唯一现实,现实就是合理的,合理变为现实则需要等待。黑格尔还说历史总是要出现两次,打懵了,迷惑了,震惊了,休克,静默,鸦雀无声。充满文学梦幻意味的八十年代急速谢幕,对当时的作家们而言,他们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如何应付突然后撤的语言

表达,而是另一个尖锐的选择,即对“从此以后的人”,对他们的真实处境必须做出新描述,尽管有许多作家将一头扎入历史故纸堆,在那里寻找他们未来虚构中的现实对应物。

九

很快,异常活跃的新人群打破寂静,在九十年代初的文学中出现了,作为对不许思考不再思考的反讽与报复,他们鄙视知识分子和正人君子,物质人代替了缺位的理念人,欲望填补了希望的空白。这个吵吵闹闹的人群迅速蔓延,他们乌压压走进了现实走进了电影院走进了电视连续剧走进了春节联欢晚会。九十年代的中国式乌合之众的主要特征之一是绝不参与公共事务,日常生活就是他们藏身的特洛伊木马。他们不再是单个人,他们属于一种可以轻易拷贝的“新大众”,不思考却有彼此雷同的价值观,他们自以为是傲慢低卑油嘴滑舌滔滔不绝,他们一开始是知足的,但只要稍有可能,他们就会立刻变得贪得无厌了。这一新大众人群出现的背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九十年代初所弥漫的普遍情绪,思想引退欲望凸显,放弃集体诉求回到私人生活,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集体永远不可能被某些个人所代表所利用,谁是神圣的集体代表者早已钦定,思想交予国家,身体属于自己。

十

欲望当然不是一个贬义词。欲望是真理,欲望加上没有限制的权力滥用更是真理,此类可怕的真理往往由一些异类予以无情揭破而且在黑暗之中。当初刘宾雁走出苦难不知感激非要披露不可披露之物,企图证明自己的“第二种忠诚”,盖因他的出发点与他所欲反对的对象之政治伦理如出一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以他必然落荒而败;唯有王朔玩世不恭的惊人之语“我是流氓我怕谁”才揭开了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化的华丽帷幕,预言了无道德无忌惮的欲望行动将在未来大行其道。王朔一语成谶“玩世不恭”终于成为主流,而前述王朔名句则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给出了新的解读和定义。欲望主

题还以现代史暴力革命视角、动物性解剖或浮世绘维度被深入探讨(其中稍早的有刘恒《伏羲伏羲》,九十年代后余华《活着》格非《欲望的旗帜》),其实有关“人的沉沦”的主题表达一直有先行者与勘探者,不过想在如此有限的篇幅中勾画出这样一个庞大的时代肖像走廊,作出关于人的处境之当代文学三十年历史演化的描述,肯定是一件充满风险且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再说又有谁会仔细阅读那些语境已今非昔比的时代肖像之罗列之分析——八十年代的人道主义启蒙是半途夭折的,九十年代打开了欲望潘多拉盒子却把理性与真实挡在门外。不是没有人对这一时代的普遍堕落产生深切的忧虑,但这种忧虑不仅无法阻挡大面积的“人的沉沦”,还会将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作出错误的解释。非常不幸的是这样的事情果然发生了,甚至还以历史文献的形式被后来者经常提起。一场反庸俗的文字战斗,一场无效的战斗,讨论一个漏洞百出的中国市场资本主义,讨论一个不配套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将一切问题和罪恶统统归咎于资本主义——这唯一的现代性撒旦。但是,资本主义不是一人格主体,它对一切愤懑的批判从来不做回答,因此,辩论凯旋了,资本主义失败了。二十年过去,辩论依然在情绪激昂地进行,资本主义依然树立在文化批判的靶场,批判者需要资本主义,仅仅因为他们需要批判的靶场。

十一

还是让我们暂时撇开资本主义吧!如果真的像马克思所说,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的资本造成了大多数的无产者,那么,这里许许多多无权者的产生,是否也源于权力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不,这样的幼稚猜想并不适合我,我的主题是“人的沉沦”,它不追寻原因,它只观察。它观察到,用一种糟糕的语言去批评一种糟糕的现实是不应该的,因为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糟糕;仅仅表达对缺失信仰的不满,自己却没有呈现有关信仰的启示与宗教热忱也是不应该的,因为无神论者不适合鼓励别人做弥撒。它还观察到,千禧年以来,通过文学描写和各种跨文学描写,“人的沉沦”不仅已是关系到一切阶层和所有众人的隐藏状态,而且已成为赤裸裸的状态;这一状态关系到每一个人,无论有产者还是无产者,有权者或者无权者,他们都在沉沦之中;不再有胜利与失败,不

再有抵抗或妥协；沉沦作为消极抵抗，作为同流合污，作为失败者的自暴自弃，作为胜利者的最后晚宴，沉沦与奢华同在与衰败同在与腐烂同在——沉沦者们好像全是局外人，他们围成一圈观望这一现实的最后瓦解，然后等待它的再一次重建。

序 二

程永新

从八十年代走过来的人,应该都对那个时期文学批评的活跃和繁荣记忆犹新。谁也无法否认文学批评在二十世纪那场文学复苏运动中的作用。作家、批评家与文学期刊,是文学复兴的三大必要元素。

记得第一次读到王晓明评张贤亮小说的批评文字《所罗门的瓶子》,被震撼到的感觉与读一部文学原著的情形类似,文章不仅分析了张贤亮这代作家历经磨难的社会背景,精确把握其思想脉络,更是以一个批评家的敏锐,洞察到写作者与现实的基督山情结,力图打捞起灵魂深井清浊难辨的精神之水;同样的,八九十年代相交,吴亮的一篇《马原的叙述圈套》,也给文学界和阅读者带来超乎寻常的冲击。尽管事先曾听马原侃侃大谈过他的小说经,但吴亮的这篇文章还是像一串方法论编织的珠链,串起马原当时或被人称道或不完全被人理解的一大批作品,寻找其语言密码,严丝密缝的流畅论述本身具备了回旋曲般的审美意义。我印象中,那时候马原的小说基本没有像样的评论文字,尽管私底下很多人都在谈论他的小说。距吴亮那篇“叙事圈套”文章数年后,批评家季红真姗姗来迟,在盘点总结文学成果时,才写了一篇评论《冈底斯的诱惑》的长文。

出现在八十年代前后的这两篇文章都闪耀着理性之光,但它们之所以能够震撼到我们,决不仅仅是因为思想的魔力。

我一直认为,现代中国因其缺乏强大的哲学传统和宗教传统,是我们无法走出现代性泥沼的深层次原因之一。汉民族的祖先并不缺乏抽象能力,《周易》也许就是猜测宇宙规律的一部大书,但以儒学为思想正宗的绵长传统中,强调的是君臣父子的位置,强调的是天人合一的秩序,并不注重从个体生命出发,去研究